



傅丽云 pohli@sph.com.sg

“你看，我虽然是政府局外人，但很多方面又像局内人，因为我与许多机构都有互动。”访谈中，雷普权这么笑说。

这番话，一点也没错。

多年来，他在至少75个机构身居要职，包括担任多个政府部门顾问、公用事业局项目评估小组主席、经济发展局董事会成员、淡马锡实验室主席等。

国家安全是唯一热忱

除了军备采购，他还领导登加和巴耶利峇空军基地、樟宜海军基地及地下军火库的建设委员会，参与民防防空壕计划，并共同主持一委员会，建议所有新建住宅必须设有防空壕。

“国家安全，是我唯一的热忱。”

他兴趣广泛，从外太空到地下空间。“最终目的，是所做的是否能让新加坡更安全。如若不然，我不浪费时间。”

对他来说，最珍贵的是时间，因此只做真正重要的事，而非取悦上司的事。

“我很幸运，从不必为取悦上司而做事。”

国防部前常任秘书何学渊是他的上司之一。何学渊曾打趣说：“雷教授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？他就给一张支票，让我签个名而已。”

雷普权坦言，喜欢这种关系，因为这代表绝对信任。上司的信任让他在国防部游刃有余，尤其是进行特别项目时。他也推崇“放手型”领导风格，把信任传递给下属。

他相信，当下属获得信任时，会全力以赴；若知道上司会在他们犯下无心错误时支持他们，他们也会更敢于尝试。

我国首位国防科学总长

1986年，他成为首位国防科学总长，也是国防部职位最高的非军职官员。

他回忆，当年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总长时，职权范围是在一次国防部会议上讨论的，会议由时任国防部第二部长李显龙主持。

李显龙当时说：“普权，很好，你可以按照任务书去做你写的那些事，但一年不要给我们超过两个点子。”

雷普权不解：“部长，1月2日，我已完成两个点子了！”

李显龙道：“你没听懂。你的想法太颠覆了！像国防部这样的大机构，一年最多只能接受两个这样的点子。”

记者听后，忍不住笑了。

“所以提了两个点子之后，我就得闭嘴。地下军火库就是其中一个。”

雷普权1942年生于上海，全家因战乱迁往广州、香港，1950年落户新加坡。

1965年，他毕业于新加坡大学（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）理学院，之后加入教育行列，在圣婴女校担任代课物理教师。

他天性敢于挑战，曾两次请求公共服务委员会更改教师奖学金合约——先转到英国科学委员会，再转入内政和国防部（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Defence，1970年分出国防部和内政部）。

第一次，他提出理由说：物理教师已足够多，但从事研究电离层（ionosphere）变化对高频无线电传播影响，以及利用英国UK2卫星数据进行

淡马锡防务教授、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席雷普权（83岁）今年获封殊勋勋章。他在国防、科技与教育等多个领域深耕超过60年，参与多个武器采购和研发项目，对新加坡国防策略和军力有深切了解。本期《早人物》专访雷普权，从能源安全、决策哲学、岩洞项目视角，分享其中战略。



防务专家雷普权

任职部门众多受重用 颠覆点子过多被限额

► 1985年，雷普权试乘改装过的V-200装甲车，用来发射RBS-70地对空导弹。
(受访者提供)



▲ 2014年，雷普权教授（中）与裕廊岩洞（Jurong Rock Caverns）项目团队合影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► 雷普权教授脑中常有颠覆性的构想，心里装着对国家建设的关怀。
(邬福梁摄)



◀ 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王瑞杰（左三）今年7月连同环境局局长黄康杰（左起）、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、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席雷普权教授及院长庄庆耀副教授、贸工部常任秘书（能源与碳管理）陈建隆，为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持开幕仪式。（档案照片）

科研的人却寥寥无几；因此，成为科研人员对新加坡的贡献更大。

第二次，他说内政和国防部需要他，与其为英国人工作，不如为国家服务更有意义。

1966年，他以“雷上尉”的身份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，担任测试与评估主管，在军旅生涯中服役20年，过后继续在非制服武装部队（NUSAF）担任国防科学总长达22年。

就这样，他从教育转向科研，再投身国防科技，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，倾注一生完成无数关键项目。

雷普权有两个子女、四个孙、两个曾外孙。

2001年，他接受《联合早报》专访。24年来，偶尔碰面，总看他身着一袭国防科技研究院深蓝外套，彰显他通过国防科学与系统工程对国家的恒久忠诚。

这位“系统工程大师”，也是顶级的说故事能手。自1990年在国大担任“大型系统工程”客座教授以来，他通过讲故事的教学法，给学生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忆，2002年还成为首个获颁国大工程学院“卓越教学奖”的教授。